

別涉及到的七個議題(自由民主的基本概念，司法與人權，憲政問題，言論自由，地方自治、選舉與反對黨，黨國體制的批判，國際情勢與中國問題)已經比較完整地呈現出《自由中國》的問題意識，大大方便了研究者。而且每位編選者在每卷的前面都附有自己對此專題的研究專論，或者可以說是導讀，這也顯示出他們的編選並非雜亂無章，而是有其研究關懷作為底蘊。

如果說還有一些讓我個人不完全滿足的話，那就是在每卷中，將文章按照時間排序比按照主題編排似乎更能顯現出《自由中國》關懷的變遷，能展現出一條清晰思想和社會歷史互動的脈絡。當然，這種技術上的挑剔無法抹殺編者的功績。值得一提的是，在閱讀每卷的導論時，編者對於自由民主強烈的關懷始終讓人難以忘懷，《自由中國》的精神尚有餘續，實為幸事。

晚餐之後是午餐？

● 余世存

中國人在80年代的生活多有出位之思和超越性努力。隨着「發展是硬道理」觀念的深入人心，以及社會分工的細密化，精神思想愈來愈成為少數人的事。時至今日，人們已經很少關心想想領域的進展，中國人在精神思想上的努力多已孤絕無援。人們最多聽說近十幾年的文化界很「熱鬧」，卻不了解裏面的熱鬧有何、為何、如何。



丁東等：《思想操練——丁東、謝泳、高增德、趙誠、智效民人文對話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自真理標準大討論等思想解放運動以來，精神、思想一類的虛擬空間，在中國人心中一直有着實在的位置，那時候的中國人對真理、藝術、學問、家國的熱愛遠大於發財致富的衝動，中國人在80年代的生活因此多有出位之思和超越性努力。隨着「發展是硬道理」觀念的深入人心，以及社會分工的細密化，精神思想愈來愈成為少數人的事，成為個人的事。時至今日，人們已經很少關心想想領域的進展，中國人在精神思想上的努力多已孤絕無援。人們最多聽說近十幾年的文化界很「熱鬧」，卻不了解裏面的熱鬧有何、為何、如何。而對近百年現代化史上的文化努力，更是聞所未聞，或無有輪廓。在這些方面，《思想操練——丁東、謝泳、高增

德、趙誠、智效民人文對話錄》是一本不錯的入門讀物，這本書以對話的家常形式，重構了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學術史，既是對中國人的家國人生等內容觀念的啟蒙，又是對中國人個人經驗的印證。

五位參與討論的作者都是思想學術史方面的專家，他們承續80年代文化熱、啟蒙熱的餘緒，而又有較廣的補充和較大的偏離。補充在於，他們有着樸實的中國本位，他們更關注中國二十世紀思想學術；偏離在於，80年代的文化開放性在他們對中國現代史的談論中有了中心、主線或標準，那就是歸功於自由主義的思想實績。無論如何，他們努力揭示社會歷史和學術思想真相，在打破禁區方面的勇氣、識見和一般人少見的大信息量，對讀者而言都是難得的享受。

眾所周知，二十世紀的中國多次出現在精神和社會層面分崩離析的局面。這種全面滯後造成的突破本來不止一個領域或一個中心，它必然在多個方面不約而同地進入精神的高端。但是，政治經濟等因素的介入，使得這種「滯後—解析—反應」模式呈現不同的後果。一個落後民族，其傳統精神或社會共同體的崩盤是注定的，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殘筵將散，如果我們把這種滯後下的分離看作「最後的晚餐」的話，這個社會的精神界戰士或思想者則是要尋找個人性的早餐，那早餐符合人性的真實感受，充滿朝氣、自信、人情，對長於人生百年的一日完全開放。清末民初的離析最為人想當然地理解，但正如作者從各個方面論證的，二十世紀初，

中國其實已經初步形成了現代新聞制度、現代出版制度和現代大學制度，這三方面較之中國其他領域率先而早熟地確立的現代性，早已成為其他領域甚至當下該領域夢想不得的高標。陳寅恪、錢穆等人都承認，中國社會30、40年代已經形成了較為健康的學術共同體，就是說，從世紀初的制度性建設到此時有了結構性成果，中國文明突破中的道統隱然將要建立。

本書作者從「日記的價值」、「重寫中國現代史」、「清華與清華學人」、「中國現代的教育傳統」、「自由主義傳統與重現」等多個角度為我們重現了半個世紀的歷史，讀者能夠了解，中國的早期現代化史遠非黨派史、階級鬥爭史所能涵蓋，它要豐富得多、人性得多。作者感慨，「二十世紀本來是一個很好的開局，卻走成這個樣子，確實令人痛心。」就是說，這最初的早餐再次打破，推倒重來了。原因在於，治統和政統再次覆蓋了一切領域，雖然有一些專注學術的人做了堅守，但自由主義者、或知識群體的民主黨派等第三勢力沒能校正歷史的軌迹。作者道出了一個真相：「在大多數時候，所謂亡國亡種的危險，其實是一種偏激的呼聲。」但自由主義何以不偏激，何以沒能校正、消解偏激，沒有人給出答案。不管怎麼說，到了40年代末，這個磨合不久的學術共同體再一次分離，分崩離析的思想界已經以敵人的口吻稱呼對手了，這應了最後晚餐的場景，有信徒，有叛徒，只是自居信徒的人稱別人是叛徒或敵人魔鬼而已。

二十世紀初中國已初步形成了現代的新聞、出版和大學制度。陳寅恪、錢穆等人都承認，中國社會30、40年代已經形成了較為健康的學術共同體，就是說，從世紀初的制度性建設到此時有了結構性成果，中國文明突破中的道統隱然將要建立。但到了40年代末，這個磨合不久的學術共同體再次分離。梁漱溟當年有一句名言：「一覺醒來，和平死了。」

很多北京中年人仍然記得當年遇羅克、五七一工程紀要等帶來的石破天驚的衝擊。而像遇羅克等人是在文化的命被革掉以後，思想失去了材料、參照、架構的一片空白上起步的。80年代的知識份子和晚清士人一樣，他們再一次衝擊自身利益於其中的共同體，由此產生的精神崩解一度被曲解為「資產階級自由化」。90年代則是「學問突顯、思想淡出」的年代，但仍有過熱鬧非凡的爭論或大討論。

40年代末的晚筵導致的局面不是早餐，而是午餐。梁漱溟當年有一句名言：「一覺醒來，和平死了。」是的，寧靜的、一日之計在於晨的早餐沒有了，人人得加入喧嘩的社會運動中去。人人都知道中國社會有了免費午餐，但知識人或思想者不得以屈辱的代價來領一份可以溫飽的午餐。作者以「一二九」一代知識份子的歷史命運為例，討論了吃免費午餐的人是如何消失的，他們失去了想像力，失去了創造力，他們是經師、是注解別人思想的注蟲，雖然有顧準、李慎之為他們一代洗刷恥辱，但那畢竟是後來的事，是個案，他們集體地欠了歷史和人民。一代人的頭腦消失在芸芸眾生裏，消失在待哺的現代性饑渴而不覺得的奴隸性生存裏，這是中國現代化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

但對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大國來說，思想是不絕的，儘管它有時不絕如線。百年中國也證實了這一點，即使在革掉文化的命以後，思想失去了材料、參照、架構，中國人仍白手起家，從想破頭腦中收穫到珍貴的思想。很多北京的中年人仍然記得當年遇羅克、五七一工程紀要等給自己帶來的石破天驚的衝擊。而像遇羅克等人完全是在一片空白上起步的，他們以生命的代價昭示了思想的尊嚴。「尋找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一節就介紹了那些為當下甚至當時的中國人所不知的思想者。他們的悲劇在於他們無能上升到純粹思想的高度而給今人以啟示，用一句時髦的話，他們的思想成果無能給當代人以智力的挑戰，其實一切精神思想領域的努力往往

注定如此，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成為思想家，只有極少數的思想成果能夠給不同世代的人以補益。但是，今天一隻腳跨進現代化門檻的中國人應該記住這一段民族精神受難的歷史。

到了80年代，知識份子不再滿足於免費午餐的飽食終日，和晚清士人一樣，他們再一次衝擊自身利益於其中的共同體，由此產生的精神崩解一度被曲解為「資產階級自由化」，80年代仍產生了可觀的成果。由於政治經濟因素的中斷，民族的精神思想進程迅速偏離到90年代。論者的共識是，對比80年代，90年代是「學問突顯、思想淡出」的年代，儘管如此，90年代仍延續了80年代的離析精神，有過熱鬧非凡的爭論或大討論。如人文精神大討論、民族主義的爭論、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爭論，等等。我們當下社會的學術中堅力量，多在90年代的思想大論戰中有過出色的表現。由於90年代的特殊性，這些思想界的離析、反應、突破少有跟社會、跟民生日用發生關聯。

但這一次晚餐的成果，從新世紀的眼光看來，並沒有順利進入早餐的制度裏，那就是本書稱道的現代新聞制度、現代出版制度、現代教育制度，那就是民初知識份子所示範的生存方式，精神獨立、思想自由、生計純粹。社會學家承認，當下的中國，結構先於制度確立。因此，對比80、90年代你追我趕、爭先恐後式的思想探索和思想言說，今天的知識界和思想界要矜持得多，要保守得多。社會中堅也還是80、90年代的那些人，言說者

的知識準備和學理架構也跟當年沒甚麼兩樣，只是心靈認身體為歸宿，理想為現實束縛，腦袋已受屁股支配，今是而昨非。因此，我們在當今最有聲望的社會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法學家的文字裏，發現他們跟90年代更不用說80年代判若兩人。他們在晚餐時論證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如今他們率先投靠進有着午餐的體制中去，思想的尊嚴、人性的榮譽、精神的美感、法的統治、革命的權利全讓位於一頓午餐的小康溫飽裏。他們有過青春激蕩的風雲，如今他們消失在中國生活裏了，一代人的頭腦已經下崗，消失在待哺的現代性饑渴而不覺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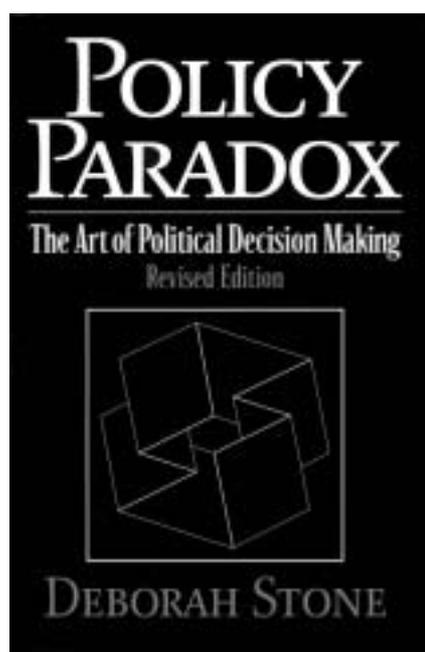
類人孩的體制內生存中去，這是當下中國的悲劇，也是現實和未來悲劇的根源之一。更可悲的在於，他們自得保守地認為，中國生活不存在現代性饑渴，所謂的饑渴只是偏激的、有害的民粹主義搗亂。民眾的生存不需要思想的助力，只需在治道的秩序裏自然演進。

本書作者對此一問題雖少有注意，但他們要求「拓展民間言論」等已經觸及到中國社會和中國精神的問題實質。因此，閱讀本書，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的文化人的歷史和現實。要知道，儘管我們的社會表面上跟他們少有關聯，但我們生活的品質仍跟他們息息相關。

對比起80、90年代，今天的知識界和思想界要矜持保守得多。社會中堅還多是80、90年代的那些人，言說者的知識準備和學理架構也跟當年沒甚麼兩樣，只是理想為現實束縛，腦袋已受屁股支配，今是而昨非。因此，我們在當今最有聲望的社會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法學家的文字裏，發現他們跟90年代更不用說80年代判若兩人。

逃不出價值的園囿

● 賀林平



Deborah Stone, *Policy Paradox: The Art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rev. ed. (New York: Norton, 2002).

在學術研究中，純粹借助於事實對象和實證方法的理性計算可能嗎？如果說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可以拋開價值偏見的羈絆，那麼，在社會科學領域——比方說，公共政策，這種可能性又有多大？自從經濟學應用數學實證方法獲得巨大成功，從而給自己戴上一個似乎不容置疑的「科學」面紗以後，包括公